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小说中国及其他

● 张贤亮 / 著



小说中国及其他

张贤亮 著

顾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中国及其他/张贤亮著

xiaoshuozhongguojiqita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862—7

I.小…

II.张…

III.小说—中国—当代

IV. I·1456

小说中国及其他

xiaoshuozhongguojiqita

© 张贤亮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1.37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3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862—7/I·1456

定价: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张贤亮(1936-)汉族,祖籍江苏,生于南京,相当大专学历。1955年从北京移民到宁夏,任教员。1957年因发表长诗《大风歌》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劳动改造长达20余年。1979年彻底平反,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代表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曾三次获得国家级优秀小说奖,获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有9部小说被搬上电影电视;作品被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宁夏文联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天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3)

第一章 统治者的宝典····· (1)

- (一)大话小说
- (二)我与世界的联系
- (三)“数学化生存”
- (四)统治者的宝典
- (五)存在决定意识
- (六)谁了解中国?
- (七)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第二章 “红地毯”····· [24]

- (一)思想游离现实
- (二)谁能充当“新的幸运骑士”的思想代言人?
- (三)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
- (四)人的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前提
- (五)阴暗面和光明面并存
- (六)“摸着石头过河”

第三章 “改造”共产党····· (45)

- (一)“当全国政协委员真好呀!”

(二)问题提出

(三)入党是当今有志之士的明智选择

(四)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有严重缺陷

(五)重要的是“换脑筋”

第四章 国民素质“乐观”录 (63)

(一)中国国民素质历来就不高

(二)西方国家国民素质趣谈

(三)“测不准原理”

(四)当代中国的国民素质比过去已有提高

(五)国民素质的提高要经过一个混乱的阶段

(六)值得“忧思”的是干部素质

第五章 呼唤“精神贵族” (84)

(一)产生不了“精神贵族”的国家是可悲的

(二)一个美国农民看中国

(三)一小部分人就能代表高品质的精神文明

(四)学者与政府官员的统一

(五)人才选拔机制与“国教”

(六)正常的社会文化大氛围在哪里受了伤?

第六章 “实事求是派” (112)

(一)树立邓小平的精神领袖地位

(二)一人身系天下之安危

(三)一句话启动中国

(四)“讲政治”

(五)中国的“幸运的机缘”

(六)“我是‘实事求是派’!”

(七)破冰船

第七章 干部素质忧思录 (139)

(一)哪一层干部令人忧思?	
(二)犯罪成本论	
(三)中国最难治的腐败现象	
(四)败坏干部素质的历史性因素	
(五)整修“国家机器”	
(六)干部腐败的制度性因素	
(七)优秀人才从官场上流失	
(八)干部素质重建	
第八章 给资本主义“平反”.....	(185)
(一)12年前我面临的一次危机	
(二)拜资本主义为师	
(三)开放大脑	
(四)流氓无产阶级自由化	
第九章 重建个人所有制.....	(205)
(一)我在1997年春季政协全国委员会小组 讨论会上的发言	
(二)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与改革	
(三)劳者有其资	
(四)我们在国有资产上的“盲点”	
(五)“到了共产主义大家都用一把牙刷吧!?”	
(六)国民集体潜意识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七)麻秆打狼两头怕与“胆子再大一点”	
(八)主角缺席和主角登场	
(九)私有制万岁	
第十章 在世纪末展望中国未来.....	(259)

“不可说”

——对 21 世纪的眺望	(261)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人永远面对的课题	(281)
挽狂澜	(295)
我怎样把“荒凉”推向市场	(309)
“票证”的副作用	(318)
“老照片”	(321)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及其后记	(329)

跋：心灵在广阔的空间遨游

——关于《小说中国及其他》的答问	(340)
附录：张贤亮著作目录	(353)

第一章 统治者的宝典

(一) 大话小说

近几年书市上,以“中国”为题的书多了起来,什么《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为何可以说不》、《中国的对抗》、《中国大趋势》、《中国战略大策划》、《为中国声辩》、《21世纪中国大预测》等等,不一而足。“中国”,真和爱情一样,一言难尽,永远是个谈不完写不完的话题。无论作者抱着什么样的情绪和观点,都能在这个大题目里发挥得痛快淋漓。我拜读了一些这类书后,发现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编辑一本的“经济蓝皮书”是在统计学基础上立论的之外(此系列每册也以“中国”为题),其他不少书尽管很“大”,实际上多半是作者情感的宣泄或纸上谈兵,所谓书生意气而已。“中国”,这个议论对象,真跟男人对女人或女人对男人一样,议论起来都是以主观感情用事的。

我应该首先申明,这本书不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评论或分析中国,更不想作什么策划或声辩,我之所以不得不在书名上冠以“中国”二字的缘故是:因为我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触动我感情或思考的人或事,总会联想

到“中国”。有文学评论家根据我的小说对我个人进行心理分析,说我有“恋母情结”。这点我承认,有“恋母情结”并不等于同时有“俄狄浦斯情结”,会用刀去杀死自己父亲的。而“恋母情结”绵绵地延伸开去,就泛滥成“恋国情结”,即“中国情结”。“中国”,像我的影子似的在我身边和心中挥之不去。“中国”,常常是我欣喜和忧虑的重要原因,她常常在我因个人某些问题而抑郁伤感的时候使我振奋,也常常在我因个人某种幸运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令我忧伤,她更常常使我踌躇自满或彻夜难眠。因而,这本实际上是记叙上面所说的“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触动我感情或思考的人或事”的书,就只好和“中国”联系起来了。

想写一本书名有“中国”的书的念头,不是最近才产生的。我很早就抱有这个想法,在写小说时就尽量贯彻了进去,我曾偏激地说我写的所有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就有这层意思在内。最近,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碰到了方法上的障碍,想在小说创作的间歇期换一种创作方式来写另一种体裁的书,于是顺理成章地就开始了这个计划。

“中国”,这个话题太大了,古今中外任何人写这个话题的文章或大部头著作,实际上也只是落入“中国”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中的一滴水珠,成了“中国”的沧海一粟。但任何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又都有资格评头品足地议论中国。然而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不论作者给自己的书名起得多么括囊一切,以“大”自命,也只能够是“小”说而已。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这本“小说”之所以“小”,就是与“大策划”“大预测”之“大”相对而言的。

此乃这本表达个人情感和思考的、纯个人色彩的“大”散文

名曰《小说中国》的由来。

(二)我与世界的联系

应该谈谈我是怎样想起写书名冠以“中国”的一本书的念头。

那还是在1969年，“文化大革命”正在疯狂的劲头上，我第二次劳动改造释放不久，从我劳改的西湖农场又回到就业的南梁农场当农工。可别以为这个“西湖”是杭州美丽的西子湖，那原来是大西北贺兰山下的一大片沼泽地和白花花的盐碱滩，后由劳改犯人开辟出来成了农场（见拙著《我的菩提树》）。“南梁”则是位于“西湖”西边的一道高高的沙脊，西北人将呈长条状的丘陵地都叫做“梁子”。西湖和南梁两个农场只隔一条铁路，鸡犬之声相闻，我劳改释放就跨过铁路到南梁农场当农工，政治运动一来我又被押过铁路去到西湖农场劳改，方便得很，好像这两个农场结成“文革”中常说的那种“一帮一”的“对子”似的。

到南梁农场，我这个农工仍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没有资格“学习”，没有资格跳“忠字舞”，没有资格听“传达文件”，没有资格阅读《参考消息》，甚至没有资格向人打听只有革命群众才可知道的国家和地方上的大事，除了在批斗会上充当批斗的靶子，任何大会小会我都不能参加，而那时我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革命群众也很少把我拉出去批斗。

总之，在“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指导下，我只是一个“促生产”的工具，好让革命群众全心全意地投入“抓革命”。在革命群众忙于革命，没功夫生产时，我就去顶班，放马的要革命了我去放马，牧羊的要革命了我去牧羊，喂猪的要革命了我去喂猪……这样，倒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全能的农业劳动者。就在这年秋天，

我被派去顶放羊的班。一人放 300 多只羊，早出晚归，也无所谓草场，哪儿有草就将羊群往哪儿赶，只须把头羊管好，注意不让羊吃了成熟的庄稼，放羊还算是个很省力的农活。荒原上的野草稀稀落落，羊群星星点点地撒在遍地，人站在中间，仿佛和世界隔绝，常有不知自己现在生活在什么年代的感觉。

交接班的时候，出乎我意外的是，除了放牧必须有的鞭杆、干粮袋、水壶和一个准备装生在野外的羊羔的染满羊血的帆布口袋，牧羊人还移交给我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原来，农场遵照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给牧马放羊的农工一人配备了一个这种传播媒体，以便于他们在野外随时随地能听到最高指示。按不成文的规定，像我这种“分子”是不能拥有收音机尤其是有短波功能的收音机的。当时，所有的外国广播电台都算作“敌台”，在农村，人们甚至以为收音机不但能收听广播，还和发报机一样可以向敌人发出情报。偏偏我顶班的这个牧羊人没学好，没有和我划清界线，竟然糊糊涂涂地把收音机也交给了我。

半导体收音机在那时算“高科技”产品，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新奇的东西。黑色的机身包着黑色的人造革，革面像人身上起的“鸡皮疙瘩”一样布满突点却又闪闪发光，机身上有几个带齿轮的旋钮和开关，还没有一点磨损的痕迹，显然牧羊人压根儿没用过它。它虽有一股我熟悉的羊膻味，又有一股我从未嗅到过的无可名状的非自然的气味，把它和土制的烂鞭杆破皮袄瘪水壶放在一起，距离遥远的时代一下子被压缩变形，给人一种极不谐调的、仿佛超现实主义静物画的感觉。刚开始我还不会摆弄，怎么弄都弄不响，又不敢向人请教。七搞八搞，机身后掉下一片塑料，才知道它需要安电池。那时，电池是要凭证供应的，幸好值夜班的农工配有手电筒，涎着脸皮向值夜班的人讨了两节电

池来，一安上，果然嗡嗡地响了。

没想到通过它竟能够听到外界发出的声音，我竟然可以比革命群众知道得还多，我不用参加各种各样的会，不用想方设法去打听道听途说，手里有了这玩意儿，就“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只听听那沙沙的电波声，枯寂的荒原立刻变得热闹起来，头顶上那一方蓝天立即显得更为辽阔，以至于无边。将羊群赶出羊圈，我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凑到耳朵上。

一天，它忽然发出阔别多年的外国乐曲声，好像是哪部交响乐，听到它的华彩段，简直飘飘欲仙，围在我四周的羊只如穿白衣的仙女，一个个在荒原中拂袖起舞。

于是我在两个世界中穿行，而两个世界全如梦幻一般，最终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存在。

(三)“数字化生存”

那时，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认得清中国！

这一年，听到农场的大喇叭广播了国家发布的正式消息，说刘少奇不但是一名“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我总弄不懂刘少奇怎么可能是“内奸”，是国民党“埋藏”到共产党内的“走狗”。国民党如果有这么大的政治感召力，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使一名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共产党第二号领袖臣服于自己，怎么会被共产党赶到小岛上？有自己的“走狗”“埋藏”在对方当上副主席，离完全掌握对方也差不多了。

早在1967年我还在劳改队时就隐隐约约听到这种谣传，这个荒诞的传言使我马上联想到1953年的贝利亚案件。斯大林